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金禧校慶

鄉村牧區：
1930年代中國基督教會
鄉建理念的追尋

劉家峰



1951-200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金禧校慶

鄉村牧區：
1930年代中國基督教會
鄉建理念的追尋

劉家峰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鄉村牧區：1930年代中國基督教會鄉建理念的追尋

劉家峰 著

© 劉家峰 2001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發行：文星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4號
新科技廣場1521室

電話：(852) 2997-7533, 2997-7577

傳真：(852) 2997-7211

網址：<http://www.mansbook-ws.com.hk>

版權所有，本刊物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Rural Parish: The Search for Christia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1930s

CSRCS Occasional Paper No.6

by Liu Jiafeng

© 2001 Liu Jiafeng

Published b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tributed by:

Man's Book Company Ltd.
Room 1521, New Tech Plaza, No. 34 Tai Yau Street,
Su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Tel : (852) 2997-7533, 2997-7577
Fax: (852) 2997-7211
Website: <http://www.mansbook-ws.com.hk>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ISBN 962-85255-6-5

作者簡介

劉家峰

1970年生，山東日照人，199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1997年獲山東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2001年獲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任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講師、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曾任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歷史文化研究所（1999）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訪問學人（2001）。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基督教史、中國教會大學史。發表論文有〈基督教與近代農業科技傳播：以金陵大學農林科為中心〉、〈農業傳教與中國基督教鄉村建設的起源〉、〈調適與衝突：1950年前後的教會大學〉、〈抗戰時期的教會大學與國民政府〉等10餘篇，編譯有《之江大學》（1999）、《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與章開沅等合作，1999）等多種。

鄉村牧區：1930 年代中國基督教會鄉建理念的追尋

劉家峰

自 1907 年開始，一批受過農學訓練的傳教士來華（通常被稱為農業傳教士，agricultural missionary），他們看到大部分中國人口生活在貧困鄉村，就提倡用農業改良等手段幫助農民改善經濟條件，農業也開始被用作傳福音的工具。農業傳教在二十年代逐漸成為基督教在華繼佈道、醫療、教育之後又一項大的事業，被譽為基督教事業的「第四維」（the fourth dimension）。¹ 抗戰前夕，基督教鄉建運動和全國範圍內興起的鄉建運動同樣盛極一時。但教會在農村建設中的工作，是否如同一些學者所言，「顯然是跟隨著當時政府的建設途徑而作出的努力」的呢？² 雖然基督教會和晏陽初、梁漱溟以及政府等所從事的鄉建運動都有著共同的目標，即改善農民民生，挽救農村經濟，但基督教的鄉建運動除此目標之外，更有傳揚福音和建設鄉村教會的關懷，鄉建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基督教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她要追求一種符合基督信仰和教會發展的理念。本文擬對此過程做一梳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基督教運動在中國鄉村所面臨的困境和解決理念，以獲致此鄉建理念對中國近代基督教運動的意義。

一、二三十年代基督教面臨的鄉村挑戰

「挑戰」（challenge）是教會常用的一個辭彙，基督教作為一種外域文化和信仰，在它面對具有另外一種文化、信仰特質的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時，自然會有一種被「挑戰」的感覺。教會認識

到要實現「中華歸主」，必定要使佔中國人口80%以上的鄉村「歸主」，這樣，龐大而又落後的鄉村在物質和信仰兩個層面上構成對基督教的挑戰。早期一小部分農業傳教士、教會所開拓的鄉村工作，只是對鄉村挑戰的初步回應，到二三十年代，基督教所面臨的挑戰不僅依然存在，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劇。這些挑戰來自教會內、外兩個方面，先看教會外的挑戰。

（一）教會外的挑戰

中國龐大的人口和不太遼闊的土地，加上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度，構成了近代以來最基本的鄉村問題——人地矛盾。中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頻仍的國家，根據李文海等著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的資料統計，僅從1926-1933年間，全國發生大小自然災害就有百次以上。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和西方大量農產品在中國的傾銷，導致農民收入急劇降低。種種不利因素把農民和農村推向了絕對貧困的境地，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有了「農業破產」的叫喊。此種背景之下，各階層有識之士喊出「救濟農村」、「復興農村」的口號，在1928、1929年，一些知識份子和教育機構幾乎同時把興趣和精力轉向鄉村，「到民間去」成為當時一股潮流，各種各樣的鄉建機構和實驗區雨後春筍般成立起來，鄉建運動成為中國三十年代最蔚為壯觀、影響最廣泛的社會改造運動。

基督教團體雖然是中國鄉村建設的先驅，但在三十年代初廣泛興起的鄉建運動中，它卻只能瞠乎其後，風光不在，不再居領導潮流的地位。除了來自全國性鄉建運動的挑戰之外，另一種更具革命性的鄉村運動，她無論對基督教還是對中國社會都具有更大的震懾力，這就是基督教所經常提到的「共產主義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1927年的這段時間裏，並沒有引起基督教人士的多大注意，教會關於共產主義的討論也多從理論上，或以蘇聯為例進行比較、說明。但從中共轉入鄉村開始領導農民武裝革命時，教會對共產黨的憂慮增加了，這方面的研究和討論

多了起來。在三十年代，中共留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一群殺人放火的土匪強盜」，這當然是因為國民黨控制的報刊輿論惡意宣傳的結果，連博學多識的梁漱溟也免不了這種認識，³基督教人士更不例外。畢竟，當時和共產黨有過親密接觸並且能認清其性質的教牧人員並不多見。很多教牧提起共產黨在鄉村的活動時，總是把他們同當地的土匪、散兵遊勇一樣看待，認為他們是造成當地老百姓恐慌的主要原因。⁴1930年後，曾在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周邊工作的傳教士對共產黨有了近距離的觀察，共產黨和紅軍的社會重建工作受到當地百姓歡迎的事實，激發了他們對共產黨的思考和對基督教自身的反思。美國公理會華南差會的傳教士牧恩波（George Shepherd）注意到共為主義的發展是「因為這塊土地上不滿的人太多了」。他在一封信中進一步描繪了共產主義對基督教的挑戰：「共產主義當然是華南值得注意的一種力量，是一種住在隔壁使人認真考慮的現象。它的隊伍中有基督徒，他們聲稱終於找到了這種高尚的偉大的運動，他們願意為之獻出一切。它的方法是殘酷的，但它的目標在一些方面和我們是一致的，它無所畏懼地把基督教倡導的思想付諸實踐。我們不能無視它，正如不能無視太陽和月亮一樣。」⁵

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Lewis S. C. Smythe）曾對共產主義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他列舉共產主義對基督教的種種威脅，如用暴力、階級鬥爭和獨裁的手段建造新社會，對人類的自由精神造成很大威脅；唯物主義的教條會遲滯對宇宙真理的發現；共產主義對所有宗教的破壞態度等，但他認為共產主義最直接的威脅是它「偷竊了基督教的思想」。⁶所謂「偷竊了基督教的思想」，是指基督教也有為底層人們爭取社會正義的目標計劃，但共產主義卻把他們付諸實踐，因此，史邁士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對基督教構成的這一挑戰大於任何其他運動。⁷教會也認識到共產主義不僅通過試圖改變社會下層的命運來吸引他們，共產主義的宣傳也紳紳吸引了一班熱忱有為的基督徒青年，使教會方面直接間接地蒙受人才的損失。⁸因此，在1933年夏天，長江流域的傳教士在江西牯嶺集會時，曾專門以「基督教如何能如共產

主義有號召當代青年的力量」為題進行討論。

面對共產主義的挑戰，基督教會開始尋求一個更完美的方法來實現挑戰者所設立的目標。1934年6月的《教務雜誌》社論以「超越共產主義」(Beyond Communism)為題討論應對共產主義的問題。他們認識到不信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卻在做著基督教的事業，而教會只是滿足于口頭談談，這才是問題之所在，⁹因此，基督教只有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目標，即社會秩序的基督化和經濟正義，才能超越共產主義。¹⁰但他們也意識到超越共產主義是一項「比鑽到地核還艱巨的任務」。¹¹共產主義的挑戰造成基督教的競爭觀念，但並沒有被看成敵意的競爭，相反，一些傳教士還認為，雙方因為目標一致，還可以進行合作。史邁士就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合作「並非是沒有希望的」，「共產黨補充了基督教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成為有價值的同盟軍」。¹²也有傳教士認為共產主義和基督教都面臨目前社會危機的挑戰，儘管起點很不一樣，也有很多差別，但還有一些共同點，都在真誠、努力去尋找正確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都是成功的，他們的路也會走到一起。」¹³

這種與共產黨合作的願望未免太樂觀而不切實際，倒是國民政府與基督教協進會聯合在蘇區（在江西黎川）發起的鄉村建設運動，為教會提供了一個「超越共產主義」的絕好實驗機會。雖然共產黨和紅軍被迫撤到西北，但教會認識到「紅軍和蘇維埃的威脅並沒有結束」，《教務雜誌》的社論提醒說：「應該清楚地記住，在很大程度上激起這些紅色反抗的經濟無保障的狀態仍然存在」；「所有這些都是對自稱比共產黨想得更深、存在得更長久的基督徒的挑戰」。¹⁴而當時一些基督徒認為應對這些挑戰的唯一方法就是鄉村建設。的確，三十年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使基督教在鄉村建設方面更清楚地認識到它的責任，並造成與共產主義一決高低的實驗。

（二）教會內的挑戰

在1927年前，以農業傳教士為核心的少部分教會團體，在提倡農業改良和鄉村建設方面做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雖有一些教會積極回應，但從整體上來講，教會界並沒有把鄉村工作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無論是差會、教會的政策、教牧人員的意識，還是鄉村教會的事工計劃、神學院領袖的培養等，都還沒有根本性的轉變，這對教會的鄉建事業來說，無疑是更嚴峻的障礙。

來華農業傳教士本來就不算多，即便如此，很多人並沒有得到重視，在中國局勢混亂或在差會經費緊張時，農業傳教士往往最早被召回。原因很簡單，他們是來得最晚的傳教士，資格最淺。而且，很多來華的農業傳教士並沒有被安排到合適的崗位；有的去了中學，或負責看管孤兒院。¹⁵從1907年到1932年共有51名農業傳教士在華工作，但到1931年4月美國平信徒調查時，卻只有20名仍在服務，其中，金大、嶺南各5名，另10名在各地傳教站，31名已返回美國或離開農業領域。¹⁶農業傳教士的大量流失，一方面可以解釋為，這些農業工作者在美國所學的知識並不符合當地的需要，因此工作經常受挫，比如他們引進的水稻新品種，生長期太長，只能種一季，而當地都是種兩季；另一方面也說明，農業傳教的價值還遠不為教會認可。人們對農業傳教士通常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中國農業經歷四千年，已經發展到極限，不會再有什麼提高，因此農業傳教士沒什麼東西可以教給中國農民的；二是農業工作沒有宗教性，也不是傳教士應該做的。¹⁷中國傳道人只對直接能給他的教會帶來資助的傳教士感興趣，但農業工作的周期又太長，結果，他們常常覺得農業傳教士並不能對他的教會有什麼貢獻，因而失去對他們的興趣。所有這些，都使在華農業傳教士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從基督教協進會的政策來看，雖然在1922年就成立了專門的鄉村問題和鄉村教會委員會，並著手調查和研究鄉村工作，但從1926年後該委員會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措來改進教會鄉村工作。更嚴重的是由於協進會缺乏一名專職的鄉村執行幹事，直到

1929年初，才聘到回國不久的張福良。¹⁸因此，協進會鄉村委員會的工作實際上是很虛弱的，各項決議、計劃往往只停留在紙上談兵。

從鄉村教會的領袖來看，無論是傳教士還是本土的牧師、傳道人，都還缺乏基本的鄉村工作方面的訓練，結果導致城市和鄉村的傳道人沒什麼區別。雖然在1926年基督教農村領袖會議上已明確要給鄉村牧師和佈道員、學校教員和平信徒以農業方面的培訓，但除了金陵大學提供鄉村師範學校和短期農業培訓課程外，教會學校從整體來講，對農業和鄉村問題是不重視的。1922年巴頓調查團曾建議，基督教的農業教育應重點發展中學、職業教育和農民學校，但根據美國平信徒的調查結果，差會並沒有認真嚴肅地對待這些建議。各神學院的課程仍模仿或照搬西方，以正統的聖經研究、教會歷史、神學為主要課程。由於農業培訓機關的缺乏，鄉村教會領袖方面的訓練則要等到1931年金陵神學院正式設立鄉村教會科以後。還有，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鄉村牧師一直在向城市流動，教會只派一些能讀馬太福音者作為鄉村教會領袖，多屬中等偏下人才。差會、教會對鄉村的忽視也使很多中國基督徒對鄉村牧師不看重。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一位鄉村牧師曾對張福良說他如何安排三個兒子前途：最聰明的兒子去學醫，差一點的去當老師，最不聰明的去做牧師，理由是「當牧師不需要動腦筋，至少可以做個鄉村牧師。」¹⁹可見鄉村牧師在人們心中佔有的地位。

這樣的鄉村牧師當然也不會在事工方面有什麼創造性。根據美國平信徒調查團成員安得生（W. A. Anderson）1930-1931年間在中國八個月的觀察，結論是中國各地鄉村教會的事工都和西方相似，只有少數地方的教會開展平民教育，或與其他機構聯合開展種痘等衛生活動，大部分牧師很少關注社區福利問題。當他向牧師、傳教士建議擴大社會服務事工時，通常有三種回答：一部分人坦率承認這些事工是需要的，但由於缺乏訓練而無法有效進行；第二部分人認為這些事工並不是基督教在中國的使命，

他們批評差會把重點放在世俗的教育工作；第三部分人，特別是華北地區，大多數人強調應當開展綜合性的事工。²⁰安得生的調查反映出教會的鄉村事工大部分仍是從福音入手，平時主要工作仍放在教堂或家庭的禱告，社會服務很少，甚至是反對。這樣的事工很難引起青年學子加入鄉村教會工作的興趣，張福良曾觀察到，晏陽初和陶行知雖然都是熱心的基督徒，其鄉村建設工作卻是以社會為立場，而處處表現出基督精神，所得試驗之結果，也大大獲得多數教會大學學生的同情。²¹

教會自立問題在教內已經喊了很多年，二十年代初期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使得教會自立更為迫切，但真要自立，首先是經濟上的獨立談何容易！影響教會自立的因素有三個：一是預算；二是會友的數目和經濟能力；三是會友的奉獻多少。根據安得生的估計，一個稍大的教會，如果有一個專職的當地牧師，每年預算不能低於400元，其中360元為牧師工資，40元作為教會開支。如果牧師工資再高一些，教堂有些債務，預算要達到1200元。而根據卜凱（J. L. Buck）對13個地方的139戶基督教家庭的調查，每戶平均每年奉獻有2.18元。另據對美以美會華中議會五個地區的2491名會友所做的調查，在1930年每人平均奉獻為1.75元，華北公理會的三個地區年平均每人奉獻為2.18元，南方經濟稍發達地區要比北方高一些。安得生認為每人年奉獻1元的估計是很保險的，這樣，400元的預算就需要至少400名會友。²²根據安得生的調查，當時河北、山西華北公理會鄉村教會的會友數平均只有71名，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大會在1929年的統計數位是80名。安得生認為中國典型的鄉村教會平均只有40-50名會友，還有佔很大比例的教會擁有的數目更小。²³這就不難解釋中國鄉村教會自立為何很難了。會友奉獻不多的原因，除了跟貧困直接相關外，這與中國人的傳統也有關。傳統上，中國人遇事才求神拜佛，並不惜奉獻，以求回報，而平時沒事就不會拜。因此，卜凱認為，要想實現教會自立，必須使教會的組織形式和事工讓會友感到「有用」，並值得捐錢支援。²⁴

教會的宗派意識也是影響鄉村工作成敗的一大因素。本來熱心開展鄉村工作的教會就不算多，人才、資金缺乏，再加之囿於自己宗派的小圈子，除了偶爾與教育機構開展一些聯合培訓的工作外，宗派之間各不相謀，很少就鄉村工作展開橫向交流與聯合，即使在同一個地區也是如此，不僅使本來有限的各種資源不能共用，有時還導致工作的競爭和重復。協進會名義上代表大多數新教團體，但它實際上由於經費、人力資源的缺乏，並不能發揮實質性的作用，只起到顧問、開會討論的作用，結果決議很多實施很少。

從以上概括性的論述可以看出，不論從教會外部，還是從教會自身來觀察，基督教的鄉村建設在三十年代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因此，如何應對這些嚴峻挑戰，就成了教會尤其是那些想把基督教鄉村建設向前推進的教牧人員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怎樣才能使鄉村教會成為一個發光的活躍的事工中心？怎樣才能從處在鄉村社會生活的邊緣，到成為鄉村社區的中心？

牧師怎樣以各種可能的具體方法，幫助社區的每一個人改進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而不只在禮拜天對少數的教友講道？

怎樣才能制定一個有價值而且有功效的鄉村事工計劃，足以吸收並抓住優秀的青年學子，使他們找到一些為上帝為國家的適當事工？而且這樣的計劃在內容上彼此相關，又可以自立自養？

基督教在全國農業和鄉村生活改進方面中曾是先驅者，那麼現在基督教的鄉村建設在全國鄉村建設運動中又應佔怎樣的地位？她對基督教運動應有何貢獻？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和實踐就構成了三十年代基督教會對鄉建理念追尋的主要內容。

二、教會回應與鄉村運動的發展

近代基督教運動作為一場普世性的運動，深刻影響了世界各國基督教運動發展的歷程。中國基督教鄉村運動的發展也不例外，一方面它是基督教對中國鄉村危機和各種挑戰的回應，同時，它也和世界基督教鄉村運動的發展息息相關，這兩者成為基督教鄉建理念的資訊來源。

（一）耶路撒冷會議、包德裴與美國平信徒調查團訪華

農業傳教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e Missions）自1920年成立後，就逐漸成為一個教會農村工作經驗和資訊交流中心。該組織每年年會都能聚集美國各差會的數百名鄉村行政人員，以及正在休假的農業傳教士。當時農業傳教並沒有得到教會主流的認同，通常僅被看作是一種業餘愛好。²⁵通過聯合會幾年的努力，一些教會慢慢開始認識到農業傳教的巨大價值，世界基督教協進會也開始予以支援。作為協進會主席和青年會世界協會總幹事的穆德（John R. Mott），1928年與在印度的38名農業傳教士集會，號召教會發起一場世界性的鄉村運動。因此，在同年3月24日至4月8日，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在耶路撒冷召開大會，農村問題成為會議的一個熱門話題，因為參加這次大會的很多代表都是來自亞洲、非洲的後起教會，而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部分都是農民。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做了細緻的籌備工作，派出遊行幹事到各地徵求意見，多次開會研究耶路撒冷大會要討論的議題。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就鄉村教會和鄉村工作問題，特地準備了大小兩份報告。²⁶

耶路撒冷大會發表的宣言強調「人是一個整體，他的靈性生活植根於他的身體、心理和社會生活之中」，因此，「宣教事業應當有較廣的範圍，藉以服務人生的各個方面。」²⁷這個充滿社會福音性質的宣言得到與會人員一致通過，是這次大會各項決議的精神內核，成為日後各國基督教工作的理論基石，也是這次會

議討論鄉村教會工作的起點，因而被廣泛引用。大會特別安排美國著名農業專家包德裴（Kenyon L. Butterfield）和其他 6 名富有經驗的農業傳教士參加。包德裴做了「基督教與鄉村文明」的演講，對鄉村事業的意義、指導原則、方法和手段等都做了闡述。他指出鄉村文明要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基督化，只有靠本地組織的人民以基督教的精神來工作和生活；要基督化鄉村，「不能單靠勸東一個西一個的個人歸主，也不是在社區裏建個教會就可以的，除非教會努力使整個社區過著基督化的生活」。²⁸ 其他一些農業專家分別就教會與鄉村生活關係問題、改進教會農業計劃等做了報告。這次大會關於鄉村工作的討論取得了很大成效，明確了教會對鄉村建設的責任，認為基督教應對此作出特別的貢獻，即「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鄉村工作都是傳教事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領導建設一個鄉村文明，基督是其核心……使鄉村人民朝著有理性、有文化、高效率的方向發展，組織並領導他們，使他們分享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解放。」²⁹ 會議提出的「建造基督教的鄉村文明」就成為世界各地基督教鄉村工作的哲學。

在張福良看來，耶路撒冷會議還標誌著另外一個進步，即更強調鄉村社區的基督化（Christianization），而不是福音化（Evangelization）。從理論上講，這兩個詞並無本質區別，是同一件事情，一方自然會引起另一方。但基督教在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卻說明實際並非如此。很多鄉村教會有著二十到七十年來的歷史，擁有二十到七十名的會友，這樣的團體本應成為他們社區的「酵母」，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卻失去了酵母的作用，起不到基督化當地社區的作用。³⁰

耶路撒冷會議關於基督教鄉村工作的決議意義深遠。它把「天國建在地上」的社會福音神學落實到鄉村，第一次申明鄉村工作的目的是要建設一個「以基督為核心的鄉村文明」，或是說「建立基督化的鄉村文明」，用基督教的精神來影響整個社區，這成為各國基督教鄉村建設工作的追求目標。耶路撒冷會議標誌著農業傳教與鄉村工作得到了充分注意，並被正式承認是基督教

繼傳道、醫藥、教育之後的又一大事業。一場世界性的農業傳教和鄉村建設運動從此展開，中國基督教的鄉村運動也正受到此股潮流的推動。

耶路撒冷會議後不久，包德裴將作為世界基督教協進會鄉村工作顧問，到世界各地巡視，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迅速向他發出了邀請。在張福良的安排下，包德裴於1930年11月開始了他的第二次中國之行，從北向南，依次到達河北昌黎、天津、保定、華北的一些鄉村、北平、定縣、齊魯大學、金陵大學、上海、香港和嶺南大學，1931年1月16日離開中國前往馬尼拉，2月26日返回上海，接著分別在北平、濟南、杭州參加一系列教會鄉村工作會議，直到4月23日離開中國前往日本。包德裴除考察中國教會的鄉村工作外，重點在於與中國教會交流他關於鄉村工作的一個基本理念，即「鄉村牧區」計劃（詳見下面部分），希望它能在中國推展。1931年4月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在杭州召開第八次大會，包德裴在離開中國前參加了是次會議，他關於鄉村建設的牧區計劃在會上再次引起各地代表極大興趣，這次會議後被稱為「包德裴會議」，被看作基督教「鄉村運動新生活的起點」。³¹他在訪問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之後，出版了一本名為《東亞教會的鄉村傳教：報告與建議》的書，裏面系統地闡述了他對中國基督教鄉村工作的看法。³²

幾乎和包德裴訪華同時，美國平信徒海外傳教事業調查團也來華訪問，隨後出版了一卷題為*Rethinking Missions*的總報告和七卷附屬報告，其中第二、五卷是關於中國。平信徒調查團秉持耶路撒冷會議的精神，強調了「人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批評以往傳教士只注重口頭講道，認為那是下乘的方法，「因為基督教的生活，可以不靠言語宣傳，而用行為及榜樣傳遞給別人，所謂行道勝於講道。」³³對於農村工作，調查團極為重視，認為「謀求農村生活及農業的進步，是遠東宣教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是基督教徒在農村裏應有的工作。」但調查團反對把農村事業看成是引人入教的工具，或成為教會自食其力的方法，因為這不

合耶穌的精神，他們從事農村工作，「因為他們是基督徒，不是因為他們要叫人做基督徒。」³⁴

調查團對中國教會的鄉村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評，建議神學院、鄉村訓練學校應當集中力量訓練鄉村教牧人員；如果經費許可，應該增加農業傳教士的數量，特別是華南地區；還建議加強金大農學院的人員，並通過鄉村教會進行農業推廣。鑒於鄉村教會的工作太分散，調查團認為在有前途的領域應該集中力量，建立幾個鄉村建設的中心，特別是在華北。³⁵調查團報告出版後，不僅在美國，在被調查的四個國家中也引起熱烈討論，由於不同宗派神學觀念的差異，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如前面所述，調查團反對把農村工作當成教會自立的方法，就不太為中國教牧人員接受。但調查團所提出的問題和建議，還是引起中國鄉村教會工作者的反思。

（二）定縣討論會與鄉建運動

根據美國平信徒調查團在中國的問卷，有77%的答卷認為耶路撒冷會議宣言完全正確，17%認為是部分正確，沒有人認為是錯誤的，可見，宣言精神被中國教會廣泛接受。同時進行的關於農村工作的調查中，有87%的教牧人員認為，差會和教會應聯合起來，加強對農業和社區生活的改進。³⁶很顯然，教會對農村工作的重要性較以前有了更充分的認識，但由於教會資源的限制、教會對宗教的狹隘理解等因素，教會的鄉村工作「仍未至登峰造極之時期」，³⁷或者說，這時基督教的鄉村建設，雖然教會內有時自稱為「鄉村運動」，但比起來當時全國已開始興起的鄉建運動，實際上還不足以稱之為「運動」，鄉建工作需要找到一個突破點，以帶動教會對鄉建的熱情和投入，並找到適用的方法。這個突破點在1930年協進會發起的「五年佈道奮興運動」中找到了。

五年運動的發動，緣於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浪潮之後，全國教會都覺得中國信徒的質量必須再求深造，數量再求擴充，在

1929年春，全國教會舉行的五處分區會議和隨後的杭州全國大會上，都認為中國教會有重新奮起的必要，方法是聯合全國教會，一致動員，並確定工作目的，對內鼓舞信徒的靈性發展，對外則闡明福音，並做大規模的宣傳，「求主奮興教會先奮興我」是這次運動的口號，以宗教教育、基督化家庭、識字運動、擴大佈道、受託主義、青年事業為六大工作計劃。五年運動原定於1930年1月開始，後因種種原因，延期舉行。³⁸對教會而言，識字不僅是人們增加知識的一種工具，更有宗教教育的目的，希望教友都能閱讀聖經，得到主耶穌的真理，特別是在鄉村中，因為農民教友識字率最低，識字運動就成了基督教鄉村運動的首要內容。

為推進識字運動，協進會決定召集全國基督教識字運動研究會。由於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效，開辦鄉村識字運動最早的保定公理會也有很好的效果，決定在定縣召開。1930年4月24日至5月10日，本預定30人與會，但到達者多達90餘人，來自十一個省、九個宗派的教會。第一、二天到各地參觀教會所辦的平民教育事業，從第三天及隨後的兩個禮拜，在定縣研究討論識字運動的種種問題。各代表對晏陽初提出的以平教方法進行四大教育來解決「愚、窮、弱、私」問題深表贊同，主張各地教會應舉辦各種訓練會或暑期學校，訓練從事上述四種工作專門人才。³⁹當時全國上下都在極力提倡此事，而各教會致力於識字運動適逢其時，因而在五年運動中，識字運動在農村取得的成績也最大。就象平教會在鄉村的發展的一樣，從開始作為文化教育的識字運動，逐漸擴展到生計、合作、衛生、娛樂等方面，形成綜合性的鄉村建設運動。可以說，到1933年，基督教界也已基本形成了有聲勢的鄉村建設運動，這年在定縣召開的鄉村建設討論會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

1933年4月7至20日，在定縣又召開了基督教鄉村建設討論會，會議的主題是「基督教對鄉村建設應當有何貢獻」，共有14個省份、18個教會團體的186名代表與會，其中有150名中國人，36名外國傳教士，很多代表都是教會的高層領導。會議